◆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由来和使命

□姜鲁鸣 王文华

国家安全委员会本质上是国家应对现代综合安全需要的产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国家安全事务主要是由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一制度无疑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战争中走来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当时安全威胁相对单一紧密相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到 1962 年、1969 年和 1979 年的几场自卫反击战，都是由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作出的重大决策。

1997 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了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开始考虑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设立。1999 年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警醒了中国人。当时，我国虽然在第一时间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也作出了正确决策，但外界评论中国作出系统反应的时间略长，暴露出安全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2000 年 9 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 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与“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有关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与外事、国家安全工作有密切工作联系的相关机构部长组成，负责对外事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这套安全应对机制，在 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看，这样的安全体制机制尚不足以有效应对现代综合安全。2007 年 1 月 11 日，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国际媒体大肆炒作，而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直至十几天后才阐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近年来，类似外交与军事等方面的协调问题也反映出，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错综复杂，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当其时。

2013 年 11 月 12 日，公布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指出，中央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决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至此，我国就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就能够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在当代中国，设立应对国家综合安全需要的最高决策机构，顺应世界趋势，符合现代化国家的安全需要，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战略谋划和运筹能力的成熟，必将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中发挥重大作用。

应对国家安全的总枢纽

从安全生态环境上看，我国是世界上不确定性因素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共有 9 个，其中有 4 个分布于我国周边；世界十大人口国，6 个分布于我国周边。特别是美国高调宣示重返亚太，把战略重点对准我国，不断挑唆周边国家折腾、消耗、牵制我国。随着国家安全利益的不断拓展，我国安全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不断增多，太空、网络、海洋等领域的斗争非常激烈，国家安全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安全的范畴，其范围愈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应对外部军事威胁，如外敌入侵时的国防安全。非传统安全又称新安全，它涉及日益拓展的领域和空间，如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网络安全、反恐怖主义等。与此相应，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手段和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主要由传统力量承担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随着国家安全的内含和外延的深刻变化，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构成和协调机构也应随之变化。而且，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不断出现，有些是跨领域的，不是靠某一系统单独能够解决的，必须有一种协调各个部门的力量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比如，网络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截至 2013 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6 亿多，手机网民达到 5 亿。可以说，现在的互联网已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破坏和渗透的重要渠道。但我国现行的互联网管理体制存在着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包括信息网络安全，特别需要从国家顶层上进行各方协调和综合治理。

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处在这个关键时期，国家安全观念的确立和相应的机制保障十分重要。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体现一个大国的安全理念。中国发展越快、空间拓展越宽、国际化程度越高，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越大，国家安全问题就会越来越重要，需要有权威性机构和顶层运作机制对国家安全问题作出快速反应。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在提升国家安全决策效率。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一直强调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挑战空前增大，国家安全形势相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要复杂得多，国家安全往往涉及军事、外交、情报、公安、安全等部门和工作，还涉及海洋权益、金融、信息化和互联网等部门。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家安全态势，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却高度分散，力量分布于政府和军队各个职能部门中，需要综合应对之时却往往“ 各自为战 ”。现有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反恐怖等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难以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机构去跟踪、分析和协调日常事务，也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资源来作出应对重大突发性应急反应，以及制定、协调和监督实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特别需要一个权威性机构对国家安全力量进行统一领导、集中决策和统筹协调，在国家层面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规划，更好地发挥统筹作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构建“ 大安全观 ”的战略思维，是应对国家安全形势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例如，如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导致我国海上战略通道中断，仅靠交通运输或能源部门根本无法应对，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协调。而且，由一个部门提出的应急方案可能局限于部门利益，无法更好、更全面地解决危机，需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综合应对。2013 年 8 月，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以更好协调各个职能部门，调动国家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加强重点地区的反恐工作。但这一机构不足以应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土壤，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在更高层级上制定全面应对恐怖主义的战略、规划、方案和措施，进而对恐怖主义进行更有效的遏制。可见，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个总枢纽，将更加有效地统筹安全维稳与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陆地和海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事务等各方面关系，促进国家安全战略的“ 一盘棋 ”运作，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提升国家外交能力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迅速发展，有效整合外交资源，减少我国和平发展国际摩擦成本的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国际安全事件的矛头、焦点和锋线前所未有地指向中国，我国外部安全决策上势单力薄的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在外部安全决策上，以外交口主导的外事领导小组负责，面对综合性的外部安全威胁，难以将国防、经济、公安等力量握成一个拳头，打出组合拳。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利于形成有效的调节机制，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构建“ 大外交观 ”的战略思维，标志着中国的外交能力的提升。最直接的体现，是减少信息上报与指令下达的环节，拉近最高决策层与事件原点之间的距离，显著提高中国应对急难险重问题、快速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的能力，降低外界误读、误判的可能，提升我国外交工作和决策的效率，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以后，中国对外部安全问题的应对能力会进一步提高，战略评估、战略分层、战略规划、战略决策和战略布局能力进一步增强，以日益增强的国力为基础，在国际社会中可以更加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有利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争取主动。

目前，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巴西、南非、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朗、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波兰、乌拉圭、智利等国都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作为国家安全领导机关，统筹协调各部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发挥外交的功能，与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对话和交流，积极开展国家安全领域的磋商，对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格局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可以成为反映中国人民共同意志、对外宣传我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重要窗口，有助于消除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对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军事力量发展的疑虑，进一步改善我国国际环境。

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这一宏大工程，涉及多方利益，尤其需要坚强的国家意志强力推进。从现实看，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赋予统筹两大建设、推进融合发展的职能，军民融合中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职能重叠的问题十分突出，重大问题都是一事一议一定，一些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有力协调和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了总体制度设计，明确提出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扎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长期的系统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国家最高安全层面上统筹协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确立了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顶层机构，有益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益于消除军地分割、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军事战略

提高指挥员决策思维能力

□刘振亚 夏 凉

见微知著的观察力

月错而风，础润而雨。战争与其他事物相较，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它的发生也总是有征候可寻，端倪可察的。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曾说，军事统帅的艺术和成功的基础，是“ 要时刻观察细枝末节，看透敌人的灵魂，采取敌人意想不到的行动 ”。

信息化条件下，大量高新科技装备的运用，让未来战场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使双方侦察与反侦察、伪装与反伪装的斗争更加激烈复杂。一个细小情况可能隐藏敌方大的阴谋，一个微小发现也可能会给指挥员带来意外的收获。要做到“ 见微知著 ”，防患于未然，必须提高熟练使用信息化作战指挥手段、快速感知战场信息、认知信息化战场的能力，练就透视迷雾的慧眼和思维敏捷、多谋善断的头脑，不被复杂诡秘的战场迷雾所困惑，把握对方意图和动向中的“ 疑点 ”、迹象和细微变化，发现掩藏在表象背后的“ 玄机 ”，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

去伪存真的辨别力

军为利争，也极易为利所惑，无数指挥员正是抓住了对手的这种心理才得以示假成功，最终赢得战争。海湾战争中美军隐真示假的“ 左勾拳 ”行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利用无人驾驶飞机，引诱叙利亚军队暴露导弹阵地雷达频率；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军声北击南的圣卡洛斯港登陆战役等，都可谓“ 兵不厌诈 ”的现代版。

拿破仑曾说：“ 对于统帅，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计更为重要，更为有用。这种眼力就是对一切假象的识别力和辨别力，在波谲云诡的战场上，如果没有这种识辨能力注定是要上当受骗的。 ”与以往相比，今天的信息化战场示假手段更具复杂性、欺骗性，给辨真识假也带来更大的难度。指挥员要使自己的推理判断符合战场实际情况，弄清庐山真面目，必须善于关注战争各个阶段的有关现象与细节，然后以此为依托，充分联系当时作战进程、双方实力、潜在意图等客观情况，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客观分析、推敲，分清哪些是能反映作战本来面目的真相，哪些是敌人故弄玄虚、别有企图的假象。

快速应变的决断力

《吴子兵法 · 治兵第三》指出：“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指挥员在战场上的决断能力，将直接关系到战场主动权的得失和作战的成败。

作战中，进攻者总是力求“ 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而防御者则总是力求充分准备，千方百计地挫败敌人的进攻。双方谁做到“ 棋高一着 ”，先机制敌，往往取决于各自指挥员的决断能力与速度。未来战争由于各种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战场态势瞬息万变，部队机动能力成倍提高，作战双方决一雌雄的时间越来越短，从而使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变化更加急剧。因而适应这种形势，更需要指挥员具备快速应变、果敢决策的决断能力，如果反应迟缓，左顾右盼、迟疑不决，势必失去战机，最终招致失利。

指挥员敏捷而正确的决断，表面看似乎只要“ 眉头一皱 ”，便可“ 计上心来 ”。其实不然，如果没有对部队全局的掌握，没有博学多知作根底，是难以做到敏捷决断的。因此，要不断提高指挥员的能力素质和决策水平，用先进的作战理论武装头脑，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从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中汲取经验教训，提高指挥决策中的洞察能力、判断能力；从难、从严加强指挥对抗演练，培养各级指挥员处乱不惊、临危不惧的良好心理素质。

◆战例启示录

由“ 旺东事件 ”看安全危机应对

□王 勇

安全危机作为一种极度危险的不确定状态或突发事件，对国家安全有着极大的影响。当今世界，虽然大的冲突与战争受到了多种因素的遏制，但各种突发事件却此起彼伏，使得国家当局进入了一种随时都需要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危机管理新时代。综观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与地区局势，在多方向、多区域都存在着诸多潜在与现实的安全危机。以中印方向为例，这里不仅存在着由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边境领土争端，而且存在着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中印双方均着眼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致力于边境局势的管控，但仍难以避免以“ 旺东事件 ”为代表的安全危机的发生。

怪哉！中国藏南地区竟被印度变成了“ 邦 ”

在中印边境东段“ 传统习惯线 ”向北到喜马拉雅山脊的分水岭，有一片约 9 万余平方千米的地区（涵盖东经 92 度到 97 度），它原属于西藏的门隅、洛隅、瓦弄和下察隅，习惯上被称为“ 门洛瓦隅地区 ”或“ 藏南地区 ”。这里不仅地处多国交界，且受印度洋湿润空气的影响，植被茂密，环境优良，物产丰富，被称为西藏的“ 江南 ”或“ 聚宝盆 ”。

藏南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引起了他人的垂涎。早在 1914 年，英殖民主义者就炮制出了一条非法的“ 麦克马洪线 ”，意图将这片属于我国的固有领土割裂出去，但遭到了中国历代政府的反对。继承了英殖民主义衣钵的印度，则借中国历史上几个时期应对外敌入侵和解决内乱无暇顾及之机，实质性地侵占了藏南地区，并将其变成了印度的一个临时“ 中央直辖区 ”，直到 1986 年，正式将它改为“ 阿鲁纳恰尔邦 ”。

有外媒认为，印度的这一做法似乎是“ 打了中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大有为 1962 年的失败“ 雪耻的感觉 ”。

印方重新审议“ 安全局势 ”挑起边境事端

印方挑起事端的背景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任印总理的英迪拉 · 甘地对印度安全局势的“ 重新审议 ”。她在 1982 至 1983 年间，曾经批准过一份由时任陆军参谋长克里希纳 · 拉奥上将为代表的主战派精心制订的“ 防御作战 ”计划。该计划通过对中印边境东段双方态势的评估认为，鉴于达旺附近地区的地形不利，有必要前出至“ 实际控制线 ”甚至“ 印方主战线 ”附近，控制哈东山脊等有利地段，以继续巩固印度在非法占领区的军事控制。显然，印军制订的“ 计划 ”为印度吞并藏南地区提供了应对“ 中国反应 ”的军事保障。

印方在“ 阿邦 ”事件上的无耻行径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印度对中方的外交抗议熟视无睹，不仅不收敛，反而在靠近“ 实际控制线 ”的达旺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挑衅行动。

印军根据高层下达的“ 猎隼行动 ”命令，在中印边境西藏方向从东到南都部署了重兵，并向锡金（已被印吞并）东北地区派遣了装甲部队，以图“ 震慑 ”中方。1987 年 4 月，印度又向塔格拉山脊派遣了数量可观的支援部队，并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起了可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前沿哨所的“ 前端哨 ”。种种迹象表明，印度不仅要确保其侵吞的“ 阿鲁纳恰尔邦 ”成果，而且想通过在边境地区的“ 蚕食 ”行动获取更大的图谋。

印将领以“ 棋盘行动 ”强化实际军事部署

印军按照既定方案，时常派遣小股力量潜至克节朗河东北的桑多洛河谷牧区搜集情报，监视中国边防部队的行踪和建立临时哨所。中国边防部队发现印军活动后，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并以开设防控点的方式，阻止印军的非法“ 蚕食 ”。1986 年年初，有关中国边防部队已在桑多洛河建立“ 半永久性建筑 ”的报告，引起了印度高层的极大关注。

时值具有“ 鹰派 ”头衔的克里希纳斯瓦米 · 桑搭吉上将接任印陆军参谋长之际。为了对抗中国军队的所谓“ 入侵 ”，他设法使印度政府批准了代号为“ 棋盘行动 ”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主要内容是通过“ 演练 ”，将位于阿萨姆平原的印军快速部署到与中国接壤的“ 实际控制线 ”附近；动用的力量涉及印陆军 10 个师和数个空军中队。“ 演习 ”中，有 1 个山地旅搭乘印军新装备的米-26 重型直升机快速进至靠近达旺的吉米塘，随后又从塔格拉山口出发，越过纳木喀措，占据了附近的哈东山口；3 个陆军师也被调到了旺敦附近；另有近 5 万兵力被部署到“ 阿鲁纳恰尔邦 ”（我藏南）的一些重要区域。

1987 年 4 月，印军向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补充了大量兵力，并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了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哨所的 7 个“ 尖兵哨 ”。这一迹象表明，印军已实际侵入非法的“ 麦线 ”以北地区，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安全挑战。

中国军队举行“ 87 · 4 ”演习应对危局

中国对印方的公然挑衅，尤其是对印军进一步“ 蚕食 ”非法的“ 麦线 ”以北领土的恶劣行径十分震惊与愤慨。高层迅即作出决断，要求军队进一步加强边境控制，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印方的蚕食、扩张行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保持边境稳定。随即，中国边防部队开始了在中印边境东段相关区域的“ 87 · 4 ”演习，决心通过在关键区域的“ 设点 ”与“ 守点 ”行动，坚决粉碎印军的企图。

1987 年 4 至 8 月，相关部队克服了高寒地区特殊地理环境对军事行动带来的种种困难，在东段“ 实际控制线 ”附近建立起了防线，与印军形成了对峙。其中，在苏鲁拉等地几乎是直接面对面地对峙。

中国军队通过控制重要通道，坚守旺东附近关键点，加强对无名湖地区的控制，以及在朗久、克节朗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了对“ 争议区 ”及其一些重点地段的有效管控，并在与印军的对峙中不断增强实力，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层面的政治与外交斗争，为最终化解危局创造了条件。

外交斡旋使得危机在战争边缘停止

在边境对峙中，印军咄咄逼人。身为陆军参谋长的桑搭吉认为，印军已同 1962 年时完全不同，装备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并在边境地区占据有利态势，完全具备了“ 围歼 ”以轻装步兵为主的中国军队的能力。他甚至叫嚣，要进入西藏纵深地区作战，“ 将战线推至雅鲁藏布江 ”……中印边境的局势似乎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一些西方媒体也断言，“ 中印间将发生第二次边境战争 ”，而“ 中国军队必将在冲突中甘拜下风 ”。

然而，事态发展并未出现西方国家预期的战争景象。这是因为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合情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故而在军事准备的同时，一直在进行着化解“ 战争危机 ”的外交努力，包括透过相应的渠道向印方和国际社会传递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如，时任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就表示，“ 如果印度从中印边境撤军，就可以使那里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 ”；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杨尚昆也在出访美国时表示，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但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刺探，中国将“ 不得不作出反应 ”。

中国软硬兼有的两手准备，让刚接手其母亲政权的拉吉夫 · 甘地意识到，与中国进行新的一场战争将得不偿失。毕竟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后勤保障方面看，在中印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对抗都是不利的。故此，他不仅不支持军方强硬派推动的边境军事对抗行动，而且采取了一些有助于化解危机的举措。包括让于 5 月赴平壤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外交部长蒂瓦里顺访北京，向中国领导人传递“ 新德里不打算继续使边境地带的局势恶化 ”的信息。7 月，拉 · 甘地在北方邦国大党支持者群众集会时，公开表明了印度新政府化解危机的意愿。他强调，“ 有关中印边界局势的错误报道是由某些西方大国蓄意传播的，目的是要在印中两国之间制造误解和紧张 ”。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来为中印间的军事对峙降温，力劝中印双方认真、现实地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正是由于各方都意识到了边境地带对峙的危险性，从而对可能升级为战争的危机进行了有效干预。随后，中印两国政府逐渐减少了在前沿地区的兵力部署，并重新开启双边对话。1988 年 12 月，拉 · 甘地出访中国，以寻求实现中印两国之间的“ 真正和解 ”。1993 年，中印签订了一项“ 以确保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 ”的协议，其中引入了“ 平等互利 ”的安全原则。至此，中印关系重归正轨。

提高中印间的安全危机风险管控任重道远

“ 旺东事件 ”解决的过程再次表明，在安全危机应对中，积极有效的沟通十分重要，这也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苏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成功经验。然而，若是只看到这一点，而忽视卓有成效的军事应对准备，那就等于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据有关资料显示，“ 旺东事件 ”中，只因中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军力部署和战争准备，才使印度最高决策当局不敢贸然犯险。

如今，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主流上看，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 新兴国家 ”，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有着相近的看法。这是双方在 G20、“ 金砖国家 ”和“ 上合组织 ”等构架中加强合作的基础。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印度洋和亚洲足够“ 同时容下 ”中国和印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印两国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经贸额至 2012 年达到 664.72 亿美元，超过了 2000 年的近 17 倍。而且，就在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中印两国总理的北京会谈，就双方在政治安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同意“ 加强分歧的管控 ”。这似乎让外界看到了“ 龙象 ”和谐共舞的愿景。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并不那么乐观。虽然“ 旺东事件 ”已过去了 27 年，可印度仍占据着藏南地区的中国领土，并在 2013 年制造了中印边境西段的“ 帐篷对峙 ”事件。近年来印方也一直不惜花费巨资提高针对中国的军备建设，一些媒体则不时炮制“ 中国威胁论 ”。随着去年 12 月印日连续 4 天在孟加拉湾举行包括海上“ 反舰 ”与“ 反潜 ”内容的联合军演，以及 2014 年 1 月下旬日本极右领导人安倍作为“ 特邀贵宾 ”，出席印度独立日庆典并宣称日印间构建深度安全合作关系，一个印日“ 新的战略轴心形成的信号 ”似乎也变得明晰起来。诸多迹象表明，中印间还远未达到可以完全“ 联姻 ”的地步。相反，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及其双方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随时都可能导致难以预期的安全危机，有必要强化底线思维，积极管控中印间的安全风险，以确保我国应对复杂挑战的战略主动。